



通识教育课教材

国学基础教程

刘韶军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際比較教育

第2回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Z126/39

2008

国学基础教程

刘韶军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学基础教程/刘韶军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7-5622-3683-2

I. 国… II. 刘… III. 国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4553 号

国学基础教程

© 刘韶军 主编

责任编辑:张红梅

责任校对:刘 峰

封面设计:甘 英

编辑室:第五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4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督印:章光琼

印刷: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21

版次: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32.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前　　言

国学近年渐热。在这个热潮中，在学术界，有专家学者创办国学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探讨国学问题，也有一些大学举办了各种方式的国学班、国学院，在社会上，有年幼少儿读经诵诗，有热心人士开办国学私塾，还有不少社会名流或成功人士慕名而来，花费巨款参加各种“国学班”。在这样纷纭繁杂的国学热潮中，历史文献学研究所的同仁们认为，有必要对国学提出自己的看法，并想为大学各专业的本科学生开办国学课程，希望由此让大学生了解什么是国学，国学有什么内容，国学对于现代社会中的人有什么意义，也希望让大学生从中知道一些国学常识，拓宽自己的知识视野，而不要人云亦云，最终于国学一无所知。我们的想法得到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与朋友的大力支持，于是着手编写了这一部《国学基础教程》。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由海内外知名学者张舜徽先生(1911—1992)创办。张先生治学沿用中国固有学术的路数，于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无不贯通，不偏于一隅，讲究治学的博大气象，故能一生成就非凡，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尊敬。张先生治学虽然不用“国学”之名，为适应时代的需要而提出“历史文献学”之名，但在实际内容上却与中国本来的国学正相符合，关于这一点，本书作者之一的谢贵安教授已有专文论述(《张舜徽与20世纪后半叶的国学研究》，《求索》2001年第6期)，本书的“国学大师及其成就”章也有论述(其中吸收了中华书局陈虎先生在“新浪网”乾元国学圈上论述张先生国学成就文章的内容)。作为先生的弟子，历史文献学研究所的同仁以及毕业出去的师兄师弟，对于国学的认识也正是受到张先生治学风格的影响，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理解，这在本书中都有充分反映。因此，我们所说的“国学”，在它的内涵、外延和本质上都带有自己的特色，并不与时下所说的各种“国学”相同。这一点希望读者理解。

国学，乃是近代西学传入之前中国固有的学术，它形成于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背景之中，又随着古代社会不同阶段的发展进步而不断有所变化。只要具有历史发展的观念，就会明白国学本身乃是历史的产物，它只适合于让它产生和存在的历史阶段。当中国社会进入了全新的历史阶段而急速发展变化之时，即在近现代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之后，原有的国学就已渐渐变成了历史之物，尤其是当中国人接受了近现代西学的理论、观念与体系之后，中国人所研究的学术就已经不可能再是原来的样子了。换言之，本来的国学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让

位于现代的中国学术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讲论国学，当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困难。今人在现代教育系统中根本不可能完整地了解国学，更不可能系统地受到国学的训练。因此，现代中国人对于国学已经非常陌生，一日忽欲讲论国学，却发现人们根本没有阅读国学书籍的能力了。所以，一些学者认为今天如欲恢复国学，至少要 50 年至 100 年，甚至 100 年还不够。此非耸人听闻的虚言，而是实际情况的反映。既然如此，我们为本科生开讲国学，也只能介绍国学的基本常识而已。希望读者明白：一方面，不可能仅仅读此一书即可登堂入室，尽窥国学之精奥。另一方面，现代的教育与学术日趋分化，既有诸多的一级学科，其下又分更多的二级学科，然后还有不同的专业方向等，如此一来，人们在学术上趋于专精，治专门之学尚属易事，而欲掌握其全体则难。而国学的特点之一就是诸部相互贯通，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也是现代学人了解和研究国学的另一困难所在，当今人们之所以对“国学”有非常不同的理解与议论，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历史既已进步，就不可能倒退。国学作为历史产物，它的不少内容还可以在现代学术框架中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也可以作为原始资料加以利用。所以，20 世纪初叶胡适等人提倡“整理国故”，先要进行整理，让现代学人能够读得懂，然后才有可能运用现代学术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今天讲授国学基本知识，亦可视为“整理国故”的工作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编写国学教程，开课讲授之，实乃不可推卸之职责，亦当仁不让之工作。

本书编写人员，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的教师为主：刘韶军（第一章，第十二章，第五、六、十一章一部分），谭汉生、宗丽丽（第二章），杨昶（第三章），李晓明（第九章），姚伟钧（第十章），董恩林（第十一章一部分），刘固盛（第十三章），王玉德（第十四章），许刚（附录）。此外，还有本校历史系赵国华（第六章一部分），中南民族大学历史系赵庆伟（第四章）、余和祥（第七章），武汉大学历史系谢贵安（第八章）。全书由刘韶军统稿、修订。

在一些章节中，采用了中华书局陈虎、华中科技大学段喜春的部分文章。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赵宏先生、张红梅女士的热心协助，并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本书又由洪胜非先生、涂耀威博士进行细心审读，提出不少修改意见，于本书最终定稿有很大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读者阅读本书如有疑问与建议，欢迎通过电子邮件赐教：bamushan@yahoo.com.cn。

刘韶军

2007 年 11 月 18 日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国学概说	(1)
第一节 为“国学”正名	(1)
第二节 现代中国人如何讲论国学	(11)
第二章 经部之学(上)	(28)
第一节 经学的形成与发展	(28)
第二节 经学的类别	(40)
第三章 经部之学(下)	(48)
第一节 三礼之学	(48)
第二节 四书之学	(53)
第三节 乐经之学	(55)
第四节 小学	(58)
第五节 经学的结束	(65)
第四章 史部之学	(69)
第一节 “史”和“史学”	(69)
第二节 正史之学	(74)
第三节 编年之学	(83)
第四节 纪事本末之学	(86)
第五节 别史杂史之学	(90)
第五章 子部之学(上)	(93)
第一节 从“道术”到“方术”	(93)

第二节 “天下一致而百虑”	(99)
第三节 诸子十家纵横观	(103)
第六章 子部之学(下)	(113)
第一节 魏晋以后的子部之学	(113)
第二节 法家与兵家	(122)
第七章 集部之学	(133)
第一节 集部的形成、发展及内容	(133)
第二节 别集和总集	(137)
第三节 诗文评	(147)
第八章 校勘学及其方法	(155)
第一节 校勘与校勘学	(155)
第二节 校勘的方法及依据	(159)
第三节 校勘学的发展史	(170)
第九章 注释学及其方法	(178)
第一节 古代注释的发展	(178)
第二节 典籍注释的名称	(185)
第三节 典籍注释的种类	(191)
第十章 综观国学著作的门径:目录学	(198)
第一节 目录学的作用与起源	(198)
第二节 目录学的发展	(203)
第三节 目录学发展的高峰	(210)
第十一章 考据之学及其方法	(215)
第一节 义理、章句与辞章	(215)
第二节 训诂	(223)
第三节 考证	(228)
第十二章 义理之学及其方法	(239)
第一节 经部之学的义理阐释方法	(239)

第二节 史部之学的义理阐释方法	(250)
第三节 子部之学的义理阐释方法	(259)
第四节 集部之学的义理阐释方法	(263)
第十三章 历代国学大师及其成就	(275)
第一节 汉、唐国学大师及其成就	(275)
第二节 宋、元国学大师及其成就	(279)
第三节 明、清国学大师及其成就	(282)
第四节 研究国学的现代著名学者	(286)
第十四章 近现代以来的国学研究	(296)
第一节 “国粹学派”与“整理国故”运动	(296)
第二节 现代学者关于“国学”的见解	(299)
第三节 近现代的国学观和当前的国学热	(306)
附录：国学基本文献简介	(315)
一、经部基本文献	(315)
二、史部基本文献	(319)
三、子部基本文献	(320)
四、集部基本文献	(323)
五、重要的集成之书	(324)

第一章 国学概说

近现代以来，人们对于“国学”的理解千差万别，很多人尝试为“国学”下定义，但至今对于“国学是什么”仍无一致的看法。本章试用形式逻辑学的方法确定“国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在此基础上，说明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应该如何看待国学等问题，本书就是基于这种认识来对国学的内容进行论述的。

第一节 为“国学”正名

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求真。所谓的真，就是事物本来的真实面目。为了求真，不能只凭主观感觉发表意见，否则意见越多，对于事物的认识就越混乱。为了求真，必须凭借真实可靠的证明与合乎逻辑的论证以形成结论。

中国古代学术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辨”谓分辨，“考”谓考察，“章”、“镜”则皆谓明。学术之明辨，是指学术不同类别之间的横向辨析；源流之考察，则是学术发展史上源流关系的纵向梳理。学术欲求真，必须包括这种纵向横向的考察辨析。细致区分事物在类别和源流上的差别，以求准确界定事物并形成相应的科学概念，这就是学术的基本要求。

自从近代西学传入以来，中国人就提出了中学、旧学、国故、国故学、国粹、国学等一系列语词，来与“西学”相区别。但人们的理解一直难以统一，最终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再次出现了国学热，人们重提国学，而对国学的理解与解释，仍然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表面上非常热闹，实际上各行其是，盛名之下，“国学”被人们任意打扮，千差万别，相差甚远。虽然都在讲国学，其实相互间根本无法对话。

于是，我们想起了孔子的名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今天来讲“国学”，必须首先做好“正名”工作。“国学”之“名”若无“正”解，关于国学的“言”论就会“不顺”。“言”既“不顺”，“事”则“不成”，最终仍会使国学如百年前一样，在热潮之后走向沉寂。

“正名”，是中国古代学者的说法，人们或许感到陌生，其实它就是现代学术的形式逻辑对于概念内涵的定义和外延的划分。孔子没有学过形式逻辑，虽然他的“必也正名”与形式逻辑不谋而合，但要进行“正名”，则须借助于形式逻辑。

金岳霖先生（1895—1984）主编了一部《形式逻辑》，其中说：“概念明确，是正确思维的首要条件。没有明确的概念，就不会有恰当的判断，就不会有合乎逻辑的推理和论证。”^①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要按形式逻辑来对国学概念进行“正名”。

一、“国学”的内涵

形式逻辑认为：一个概念的明确，就是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要明确。即这个概念反映了哪些特有属性与表示了哪些事物，这两者都要明确。

概念的内涵，反映事物的特有属性。概念的外延，指具有这些特有属性的事物。对于国学这个概念，怎样确定它的内涵和外延？可以根据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反比规律，使用“概念的限制法”，用逐渐增多概念的内涵的方法，来逐渐减少概念的外延，由此逐渐把国学的内涵和外延确定下来。

如果不对国学的内涵做任何限制，就可以说“国学是学术”，这是最基本的内涵，但也是外延最大而限制条件最少的内涵，远远不能揭示国学的特有属性。国学是学术，表明它不是政治、经济，这一点非常明显，不需要解释。接下来，还要把国学与一些相似的概念分别清楚。

第一，国学是学术而不是文化。文化概念大于学术概念，这两个概念不是全同关系，而是上下属关系。文化概念的外延很多，学术只是它的外延之一。学术是文化的核心之一，但不是文化本身。

第二，国学也不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也是文化的外延之一，但国学与传统文化有重合关系，而不是全同关系。传统文化可以包含国学，但它还包含更多的东西，不仅仅是国学这一种事物，反过来说，国学就不能包含传统文化。所以两者不是同一种事物，这一点应该也是容易分辨清楚的。

第三，国学还与其他一些事物相关，但都不是全同的关系，不是相等的关系。如读经诵经、诗词书画、汉服古董，诸如此类的事物，它们虽然都与国学有一定的关系，但都不是国学的全部，只是与国学相关的某些事物，故不能简单地与国学混为一谈。

总之，要弄清楚国学是什么，首先要弄清楚国学不是什么，也就是说，要把不是国学的东西与国学分开，才好进一步确定国学的内涵和外延。

“国学是学术”，这样说还非常笼统，只能说国学是学术之一种，或者反过来

^① 金岳霖：《形式逻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

说学术不仅包含国学,还包含其他学术。从形式逻辑角度讲,学术与国学这两个概念是上下属关系,学术是国学的上属概念,是属概念,国学是学术的下属概念,是种概念。学术这个属概念下面,除了国学这一个种概念之外,还包涵更多的种概念。这些种概念,都是学术概念的外延,它们相互之间又有复杂关系,不能等同。如国学和西学,都是学术属概念之下的种概念,二者都是学术的外延,相互不能等同。

要明确国学的内涵与外延,从国学是学术这个最笼统的定义开始,必须逐步地增加国学内涵而减少其外延,具体来说就是逐步地增加限制词,这是形式逻辑学进行定义的一个常用方法。对国学增加的第一个限制词,是“中国的”,即“国学是中国的学术”。

从字面的意义上看,国学也应该是“中国的学术”,因为它不是西方的学术。但仅有这一个限制还是不够的,因为这个说法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指“中国人所从事的学术”,二是指“关于中国的学术”。同理,西学也有两种理解:一是指“西方人所从事的学术”,二是指“关于西方的学术”。我们在说国学或西学时,应该确定是指第一种理解,而不是第二种理解。

若是第二种理解,则关于中国的学术,就有非中国人所研究的关于中国的学术,这种学术有一个专名:Sinology。由于这种学术是非中国人所从事的学术,因此它不是关于国学的第一种理解。中国人把 Sinology 译为“汉学”或“中国国学”,但不会说它是“国学”。潜意识中,是把 Sinology 与中国人所从事的学术分开了的。可知 Sinology 是西学的外延,虽然从业者不全都是西方人,但这种学术确实是西学的组成部分之一,而不是中国学术的组成部分之一。同理,中国人所从事的学术中,也有关于西方的学术,如中国人研究的世界史、外国文学、西方哲学等,它们是中国学术的组成部分之一,而不是西学的组成部分之一。总之,广义的 Sinology 当指中国之外的所有国家或地区的人士研究中国的学术,虽然所研究的内容都是关于中国的事情,但都不属于国学的范围。

把国学限制为“中国人所从事的学术”,仍不能完全反映国学概念的特有属性,因为中国人所从事的学术,在不同的时代则有根本性的差别,具有不同的特有属性,故要视为不同的学术。因此,第二步是从时间上对国学加以限制,即把中国人所从事的学术,分为古代的中国人所从事的学术与现代的中国人所从事的学术两大类别。

当然,中国的古代也可以划分不同的时期,如先秦、汉代、魏晋、隋唐、宋明、清代等,各时期的学术在不断传承的基础上也有一定的变化和特点,但与现代中国的学术相比,则属同一种学术,故把古代中国人所从事的学术视为一个大类。

中国古代的不同时期中也有外来学术的传入,如东汉以后传入的印度佛教学术,明清时期传入的部分西方学术,但这些外来学术的传入,不像近代以来的西学传人造成了中国学术的质变,所以中国古代的学术与中国近现代的学术,是完全不同类的学术,应该明确分为两类。

近代以来,从鸦片战争到晚清民初,西方列强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与中国的关系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西方的现代学术随之传入中国,最终使中国古代以来的社会、文化与学术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于是中国古代的学术就变成了现代性质的学术。这也是必须把它们分为两类的现实原因。

经过上述两次限制,国学是学术这一笼统的定义逐步变得清晰起来,至此国学可以明确定义为:国学,就是现代西学传入之前的古代中国人所从事的学术。

按照逻辑学的说法,这个定义中的“国学”是被定义项,“就是”是定义联项,其后的文字则是定义项。这样定义国学,比笼统地说“国学是中国固有之学或中国传统学术”更为明晰和准确,而且符合形式逻辑的“属加种差”定义方法:“在一个属下,可以有几个种。b种不同于其他种的那些属性,就叫做b种的种差。属加种差的定义,就是定义项是由属与种差组成的定义。”^①按照属加种差的定义法,“学术”是属,“国学”是“学术”属下的一个种,若拿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比较,其间的种差就是“中国人所从事的”。但中国学术还有古代学术与现代学术之分,其间种差就是“现代西学传入之前的古代中国人”。将这些种差综合起来,就是国学与西学和现代中国学术的种差,再把这个种差与“学术”的属相加,就是“国学”的定义。

二、“国学”的外延

对一个概念,定义其内涵之后还要明确其外延,逻辑学要求从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来检验这个概念是否正确。概念的内涵反映事物的特有属性,外延反映哪些事物具有这些特有属性,即哪些事物属于这个概念。若要明确概念的内涵,则要使用定义的方法,而要明确概念的外延,则要使用划分的方法。

为了使大家明白逻辑学的划分方法,需要先把逻辑学的相关规定简述如下:

如果一个概念只指一个单独的事物,它的外延就是单一的,不需要划分,但国学不是这种概念。大多数的概念,其外延涵盖了许多事物,甚至是无穷多的事物,因此就要用划分法,好把它所涵盖的事物分成若干个小类。这些事物同属于这个概念,因此这个概念就是一个大类,在逻辑学上称为属。而它所涵盖的若干

^① 金岳霖:《形式逻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种差,指种与种之间的差别,即每个种独有的属性。

小类的事物，就是这个属之下的种。大类或属，是划分的母项；小类或种，则是划分的子项。

对概念的外延，在一次划分之后，还可以再进行划分，称为连续划分。每一次划分都必须按同一个标准，但与另一次划分的标准则不一定相同。

划分的标准，可以是一个属性或多个属性。究竟采取哪些属性，应根据实际的需要来定。

划分时又要遵守三个规则：划分的各个子项应当互不相容；各子项之和必须穷尽母项；每次划分必须按同一划分标准进行。明白了划分的方法与规则，我们就可以以此为根据来分析国学的外延所属的事物及其分类。

根据前面所定的关于国学的定义，其外延究竟包括哪些事物？我们今天已经不能亲眼看到古代中国人学术研究的实况，只有一个办法，即通过他们传留下来的学术研究成果来了解之。为行文方便，简称为古代中国学术成果。下面我们将通过分析古代中国学术成果与现代中国学术成果有什么不同，来了解国学外延所涵盖的事物。

古代中国学术成果分为著作与文章两类，在形式上与现代学术成果有三个区别：使用古代中国语言中的文言撰写而成；其著作和文章的形式与今天的学术著作和文章的形式不同；古代中国学术成果的分类与现代中国学术成果的分类不同。根据这三点不同，可以看出国学外延的范围。

就学术成果的书写语言来讲，中国古代学者使用书面语言——文言撰写著作与文章，这是不争的事实，是古代中国学术成果最明显的特点，是与现代中国学术成果最明显的区别。

文言是古代中国的书面语言，它与现代中国语言根本不同，本身还有深浅之分，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辜鸿铭（1857—1928）曾说：

文言或书面汉语……也同样存在着不同种类。传教士们曾把书面汉语划分为简易文理的和繁难文理的两类。但我认为，这个分类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我看来，合理的分法应当是简单欠修辞的语文、通行的语文和高度优雅的语文三类。……可以称它们为普通会话的或日常事务用语、低级古典汉语、高级古典汉语。^①

简单地说，文言有简易和繁难的差别，这是人们都承认的。简易与繁难之外，又有雅与俗的区别。如古代的赋和骈文所使用的文言，就比一般的散文所使

^①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黄兴涛、宋小庆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8~89页。

用的文言要繁难和优雅。古代帝王的诏书、大臣的奏章，常常使用骈体式的文言。古代还有一些学术著作也用骈文写成，如南朝梁刘勰（约465—520）的《文心雕龙》，唐代史学家刘知几（661—721）的《史通》。更多的是用骈文撰写书籍的序文，此类最多，如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序》，南朝梁时高僧僧祐（445—518）所编《出三藏记集》序卷所录各种佛经的序文，都是非常繁难而又特别优雅的文言。

单从繁难角度讲，一些专门领域的著作也很难懂，如古代的天文历算类的著作，但这种著作往往只是繁难而不够优雅，能全书用骈文写成而且兼具繁难和优雅特点的著作，在古代也不多见。

古代中国在书面语言之外也有口头语言，一般称之为“白话”。现代提倡白话文以来，人们往往以为白话就是现代汉语，其实白话也分古代白话和现代白话，现代白话只是现代汉语的一个分支，也不完全等同于现代汉语。古代白话又与现代白话有着差别，无论是句式还是用语，都有不少差异。如古代的小说，其中既有文言，也有白话，但不完全是当时的白话，而是一种半文半白的语言。在古代一些专门著作与文章中，一般以书面语言为主，但有时也会夹杂当时的白话，如南朝宋刘义庆（403—444）所编《世说新语》。在古代的一些诗文中，也会夹杂着当时的白话用语。

虽然古代也有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之分，但总起来说，古代中国学术成果所用的语言主要是书面语言——文言，这与现代中国学术成果完全不同。这一点，是确定国学外延的一个主要标志。换言之，如果不是使用古代书面语言撰写的学术成果，就不能划入国学的外延。

现代学者之中也有人能用文言撰写论著，但不像古代中国学者纯用文言撰写学术成果，而且其成果背后的学术理念、方法与用语，也与古代学术大为不同，因此他们的学术成果应划入现代中国学术的外延，而不能划入国学的外延。此类学者及其成果，在现代中国学术中只占少数，更多的现代学者是用现代学术的理念、术语、方法研究古代中国留存下来的书籍文献，再用现代汉语书写其学术成果，因此都不能划入国学的外延。

接下来，分析学术成果的形式。古代中国学术成果的形式与现代中国学术的形式完全不同，即学术成果的撰述形式与编纂体例完全不同。古代学术成果的撰述形式和编纂体例有很多种类，如古代的文章就分为多种文体，如《文心雕龙》划分为：论、说、辞、序、诏、策、章、奏、赋、颂、歌、赞、铭、诔、箴、祝、纪、传、盟、檄等，在其篇名中又有：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名。其中的诗、乐府是诗，与文还有不同，诗本身又有多种不同体裁。又提到史传，其实史书之

体裁又与诗文不同，本身分为多种史体，如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实录体等，与诗文不同类。经书、诸子的撰述形式与编纂体例也有多种样式。总之，诗歌与文章的体例之分，是文体之分，而经书、史传、诸子的体裁之分则是书体之分，划分的标准不一样。由上可知，古代学术成果的撰述形式与编纂体例是多样的，是现代学术成果所不采用的形式与体例。

在古代学术成果中，更多的是以注释的形式和体例来撰述的。现代学者只是笼统地说注释，但古代学者则把注释从形式上分成许多种类。如张舜徽先生就对古代学术论著中的注释体式做了详细说明^①。

古人对于经书等原著加以注释，统称为传注，传注有不同的体例和流别，主要有十二种，在体例上、形式上都各有不同。关于古代中国经籍传注，详见本书的第九章，这里只简述它们的名称与意义。

第一种是“传”。传，是传述的意思。如孔子注说《周易》，汉代学者称为《易大传》，是最早对经书进行阐释的“传”。

第二种是“说”。说，是解释的意思，主要是解说经籍的大义，如《易》有《五鹿充宗略说》，《书》有《欧阳说义》，《诗》有《鲁说》、《韩说》等。

第三种是“故”。又写作“诂”，是以今言解释古言的意思。《诗》三家说，各有《故》数十卷，如《鲁故》、《齐后氏故》等。

第四种是“训”。训，是解书的通称，如《古论语》有西汉孔安国（约前156—前74）的《训解》，《论语》有东汉马融（79—166）的《训说》，东汉高诱为《淮南子》作注，每篇题下加一个“训”字，表示在原文之外加上了注释。后人却往往误以为“训”也是篇名中的一个字。

第五种是“记”。记，是疏记的意思。《礼记》，就是孔子的后学解说《礼》经的著作或文章。汉代刘向（约前77—前6）有《五行传记》，属于记的撰述体例。

第六种是“注”。注，本是灌注的意思。文义艰深的著作，就像水道阻塞了，必须灌注才能使之通畅，所以就以注作为疏通文义的名称。如东汉郑玄（127—200）有《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等。后人把“注”写作“註”，是汉魏之际才出现的写法，不合乎注的原意。

第七种是“解”。解，是分析的意思。汉代人或称为“解谊”，如东汉服虔《春秋左氏传解谊》，或称为“解诂”，如东汉郑兴《周礼解诂》、东汉卢植（？—192）《礼记解诂》、东汉何休（129—182）《春秋公羊传解诂》。

^① 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举要 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6～250页。

第八种是“笺”。笺，是标识的意思。西汉毛亨、毛苌注释《诗》经，有时太简略，郑玄就加以补充发挥，郑有时与毛有不同意见，就记录其旁，于是称为“笺”。这与自成一家之言的传注不同。后来的学者沿用这种办法，读书时把自己的心得与看法写在小条子上，粘在书上，也是笺识的意思。

第九种是“章句”。特点是对句子和段落以及全篇的宗旨加以解释，与单纯注释字、词有所不同。如《尚书》在西汉有欧阳氏《章句》、大小夏侯氏《章句》。东汉赵岐（约108—201）注《孟子》，就叫做《孟子章句》。《汉书·扬雄传》说《太玄》一书有十一篇加以解说，而“章句尚不存焉”，是说没有章句一类的传注。南宋朱熹（1130—1200）为《四书》作注，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后两种具体到各篇，又题为《章句》。

第十种是“集解”。集解，就是荟萃众说。如曹魏何晏（？—249）的《论语集解》，晋范宁（339—401）的《春秋谷梁传集解》。后来或称“集注”、“集释”、“集说”等。还有一种是聚集经传为之作解，也称“集解”，如晋杜预（222—285）《春秋经传集解》。

第十一和十二种，就是《十三经注疏》中所用的“正义”和“疏”。“正义”，是指“正前人之疏义，奉诏更裁，定名曰正”。“正义”的规则是不破注，只在旧注的基础上加以引申发明，官方撰定的称为“正义”，私人撰写的就称为“疏”。“疏”对“注”而言，也取义于治水。注是灌注，如果还不能明畅，就要再加以疏通。后人把各种各样的注释统称为“注疏”，就包含先后不断加以注释的意思。

以上诸种体例，主要是古代经学典籍中的学术撰述体例。因为经学是古代学术的主流，里面有许多圣贤的微言大义，需要后代学者不断学习、理解和阐发，故后代学者就采用了以注释为主的形式体例撰述他们的学术成果。而对古代的史学著作，也有许多种注释，又与经书的注疏有所不同，如《汉书》颜师古（581—645）注，主要是注解《汉书》中难读难懂的字句，同时也把前人注释引于其中，标明每人的姓名，自己的解释则用“师古曰”注明，这是史籍注释的基本体例。也有不同的史注体例，如南朝宋裴松之（372—451）《三国志注》，主要工作是拾遗补阙，提供比原书更多的不同记载。所补充的资料，都标明原书书名。还有北魏郦道元（？—527）著的《水经注》，不仅增加了更多的记载，还对原书及所补材料中的疑难问题或相互矛盾之处加以考证。这都是古人史学著作的不同撰述形式与体例。

除了注释这种体例之外，古代学者的学术论著的撰述体式还有多种，从书籍的不同体式来分，可以称之为书体分类。在这方面虽还没有一种权威而全面的分法，但大致可以分出类书、字书、韵书、小说、笔记、别集、总集、经传注疏、方志、